

福州崇宁万寿大藏经

毘卢大藏经雕印初探

刘 祖 陞

中国第一部官雕大藏经“北宋开宝藏”于北宋开宝四年至太平兴国八年雕成后，对佛教界影响很大。由于官刻数量有限，一般寺院不易得到，于是出现寺院私雕大藏经的创举，福州东禅等觉院所雕“崇宁万寿大藏经”（原名东禅大藏经）和福州开元寺所雕“毘卢大藏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两部私雕大藏经，也是传世的福建省最早的刻本，即使是残篇断简也被奉为珍宝。在国内有陕西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泉州开元寺、山西省图书馆、旅顺博物馆等存有零散本及残卷。在国外日本宫内省图书寮藏本最全，毘卢大藏经本所缺以东禅大藏本补之，东禅大藏本所缺以毘卢大藏本补之，近乎足本。日本藏有部分崇宁万寿大藏和毘卢大藏的地方还有护国寺、醍醐寺、金刚峰寺、本源寺、称名寺、知恩院等。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普林斯敦大学总图书馆、印第安纳波里斯博物馆也藏有零散本及残卷。本文对两藏经雕印状况作初步探讨。

一

福州东禅等觉院版崇宁万寿大藏是由嘉祐间（1056—1063）任福州知州的参知政事元绹当请主的，见于东禅大藏本黄字函

《大般若波罗蜜经》卷37末和往字函《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193末的题识。据查元绛任参知政事的时间是在神宗熙宁八年(1075)至元丰二年(1079)，可知他是在此时当了东禅大藏经的请主。历任福州东禅等觉院住持成为大藏经的劝缘首，其中慧空大师冲真是最早的劝缘首，他于元丰三年就开始募雕，中经智华、智贤、海印大师道芳、普明、广慧大师达杲，凡六代住持33年，此外还有知福州王祖道及地方名士许将等曾任都劝缘首，见于《杂阿舍经》卷9末和《宗镜录》卷75末的题识。

该藏经版式为六行十七字，许多经书卷首和卷末刻有施经原文题识及施资者姓名，板心有卷次及雕工名字，总体设计按照开宝大藏经，每函按《千字文》顺序排列。该藏经的雕印始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是从一些重要佛经开始的，其中《法苑珠林》、《景德传灯录》即为第一批造刻的要籍，杜字函《法苑珠林序》有：“福州东禅等觉院住持慧空大师冲真于元丰三年庚申岁谨募众缘开雕大藏经印板一副上祝今上皇帝圣寿无穷国泰民安法轮常转”的题记。宋徽宗在崇宁二年过天宁节下牒赐福州东禅大藏名为“崇宁万寿大藏”。牒称：“礼部员外郎陈暘自劄子窃见……大藏经唯都下有板，尝患遐方圣教鲜得流通于是亲为都大劝首于福州”，时任司空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上柱国蔡京等七名列衔。至政和二年(1112)刻成564函，每函9~11卷，乾道年间补刻十多函，达6000多卷。

南宋时和元大德年间，经板还在，并有人施资重印或补刻。如南宋绍兴三十二年任福建路安抚司参议官的王伯序曾印刷东禅大藏为其老家浙江奉化王公祠堂的镇宝之物。南宋嘉定十年(1217)来福建泉州开元寺求法的日本法华山寺僧人庆政施资印制东禅大藏经，日本宫内厅书部寮所藏东禅等觉院版《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325、卷456、卷481、卷561板心有“日本国僧庆政舍”就是明证。庆政回国时带去福州东禅大藏与福州毘卢大藏，这是中

日佛教交流史上有关大藏经流传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

二

福州开元寺“毘卢大藏经”，始雕于政和二年（1112）。为雕印该藏经，开元寺专门设立经局负责雕印实务，见于绍兴戊辰刻凤字函《妙法莲华经》卷7的题识。经局还专门生产印经用的染黄纸，故许多毘卢大藏经背捺有“经局染黄纸”的大方印。而开元寺旁的小巷亦因此得名经院巷。当时福州名士蔡俊臣、陈靖、林昭、颜徽、葛龟年、赵天与、陶珏等，都为募雕大藏经相继出任都会首；开元寺住持本明、宗鉴大师元忠、净慧大师法超、慧海大师惟冲、必强、慧通大师了一均为证会及劝缘首；行崇、圆津、德华等系劝缘沙门，负责福州市区内巡回劝募和调度雕版费用以及发行募缘卷，见于王字函《方广大庄严经》卷2题识。雕经的具体操作系由管勾僧负责，先后任管勾兼校对的沙门，有德华、开慧、本悟、僧忬、惠修、若价等。

毘卢大藏经版式为六行十七字，许多经书的卷首，在经书名称卷次后加刻题记；卷末刻有施经愿文及施资者姓名；板心有卷次及雕工名字。总体设计按照开宝大藏经，每函按《千字文》顺序排列，但雕印时间并没有完全按照顺序。根据题记，其中年代最早的是《大般若波罗蜜经》卷101，盈字函，及《大般若波罗蜜经》卷141，列字函，题记时间是政和壬辰岁十月（1112年）。在政和年间雕印的还有《同上经》卷第一，矢字函（1115年刻）；《同上经》卷554，光字函（1116年刻）；《同上经》卷161，寒字函（1116年刻）；《同上经》卷501，巨字函（1117年刻）；《同上经》卷590，奈字函。再经宣和、靖康、建炎，至绍兴四个年代，共刻成564函5800余卷，达到崇宁万寿大藏规模。此后又于隆兴二年（1164）补刻践字函《传法正宗记》（卷1至卷8）；土字函4《传法正宗记》（卷9至卷12）、《辅教编》3卷。到了

乾道八年还再次补刻一些《贞元录》和新入藏的著述。如多字函至寔字函《大慧普觉禅师住径山能仁禅院语录》、《大慧普觉禅师普说》。

三

作为全国最早私刻大藏经出现在福州并不是偶然的现象。

首先这是佛教在福建具有强大势力的体现。唐中叶后，禅宗在南方得到很大的发展，成为佛教最大的一个宗派。唐末，禅宗分出五宗，都与福建有关，创为仰宗的灵祐是福建长溪人；立曹洞宗的良价与本寂，其中本寂是莆田人；立临济宗的义玄是福清黄蘗山希运法嗣；立云门宗者文偃，是福州雪峰义存法嗣；立法眼宗的文益，是福州玄沙寺师备的弟子漳州罗汉琛之弟子。到五代闽时，王审知信佛，助长佛教在福建的传播，王氏增建佛寺267座。天祐四年正月举行的无遮法会，一次就饭斋二十万人。天成三年十二月王延钧因疾禳病许愿，一次也度僧二万人，难怪“闽中多僧”。同时王延钧还把最好的田地给僧道，“弓量土地为三等，膏腴上等以给僧道”。进入宋代，福建佛教势力仍然在发展，福州有“山路逢人半是僧”之咏，据《三山志》所载福州寺田约占民田1/5至1/6。寺院经济的发展就为佛经雕刻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同时福建各寺院的僧尼，也踊跃施资，僧尼所在寺院见于福州大藏经序跋记载的就有怀安县崇福里禅山院，侯官县崇福院、东京显静寺、侯官雪峰寺、鼓山等禅寺，身份有赐紫大师、住持、比丘尼、尼童等。再则，是福建各界对佛教的信仰及对佛经雕刻的捐助。其时，福建上至在朝任官之人，中至地方官员、绅士，下至平民百姓，无不乐而捐助，见于毘卢大藏经目录记载的有太傅大丞相李思远之妻张氏，将仕郎张杞行等。捐款数量在100—200贯（可雕印1—2函）的多雕有捐赠人籍贯、身份、姓名，另外还有大量捐款人地址与捐款数量不明的奉佛弟

子。有了如此坚实的社会基础在支持，才有可能雕成如此规模的大藏经。

第二，是受五代以来福建形成的重视佛经缮写和收藏的影响，五代时福建佛教盛行，非常重视佛经缮写，在唐乾符四年（897）王潮、王审知统治泉州时即“缮经三千卷，极越藤之精，书工之妙，驾以白马十乘，送以府僧，迎以郡僧，置兹（泉州开元寺）之楼”，王审知取福州统一福建后，更加重视佛经收藏，天复元年（901）在福州开元寺建寿山塔“辅以经藏”，天祐元年又在福州九仙山（今于山）造定光塔“仍辅以经藏”，“其经也，帙十卷于一函，凡五百四十一函，总五千四十有八卷，皆极郟藤之精，书工之妙，金轴锦带以为之饰”。天祐二年四月王审知专门为此举行藏经仪式：“大陈法会以藏其经”。同年还缮经五千卷赠给莆田的灵严寺（见黄滔《莆山灵严寺碑铭》）。到了同光六年（923）缮写佛经又达到新的高度，“王（审知）又泥金银万余两作金银字四藏经，各五千四十卷，旃檀为轴，玉饰诸末，宝髹朱架，纳龙脑其中，以灭蠹蟬”。王延钧执政后缮经活动比王审知有过之而无不及，龙启元年（933）禳病即许“饭僧三百万，缮经二百藏”。这些抄本佛经，南宋地方文人还能看到，绍兴二年（1136）齐安人郑滋，吴兴人刘峤等在福州于山万寿寺“同饭素，登三山阁，观闽王所施织经及佛”。王审知所施金银字藏经残页至今在泉州开元寺仍保留着。这些缮写和收藏大藏经的活动无疑对北宋福建民间雕印大藏经产生巨大影响。

作者工作单位：福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